



秦汉学术

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



马勇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传

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

现

传

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

现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丛

秦汉学术社会 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

马 勇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丛

秦汉学术

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探索

马 勇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222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7413-7/G·6510

定 价:17.5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9724

引 言

秦汉学术，论者向来没有多高的评价。或基于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先后经历坑焚之虐和儒术独尊两大劫难的事实，而责秦汉学术聊无新意，只是官方的御用工具而已；或鉴于儒学的经学化、经学的谶纬化、思想的佛老化等文化现象，而斥秦汉学术不是短钉之学，就是荒诞不稽。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秦汉学术的深刻见解，但考诸史事与揆诸情理，则亦容易觉得上述见解未免以偏概全，只见树木，未见森林。众所周知，秦汉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由此奠定和基本确立。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模式。与此相伴而生的秦汉学术，今日看来，容或有种种不足和可责可难之处，但过于低估它在秦汉社会乃至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显然不仅无助于认识秦汉学术的真实价值，而且也势必无法真正理解秦汉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鉴于此，从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重新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是非得失和来龙去脉，其意义之大可能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政治统一与学术选择	(1)
政治统一与学术统一.....	(1)
统治方略的新探索.....	(9)
黄老学及其对汉初学术的影响	(12)
诸子的复兴与发展	(17)
第二章 儒学独尊：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	(22)
儒学的演变与复兴	(22)
儒学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势力的受挫	(27)
儒学独尊的艰难历程	(31)
儒学独尊的思想实质	(35)
儒学的实践意义	(39)
第三章 官方学术的必然之果	(45)
黄老之余韵	(45)
儒家学派的内讧	(50)
儒学经学化	(53)
经学谶纬化	(56)
第四章 学术与政治：相对独立又无法分离	(60)
意识形态多元化	(61)
所谓今古文之争	(63)
古文经学与王莽新朝	(65)
东汉重建过程中的经学	(71)
第五章 学术统一与学术分裂	(75)
儒学传统的重塑	(75)

	虚假的兴盛与真实的危机	(80)
	智者的忧思	(85)
	学术分途	(89)
第六章	文化阐释：困惑中的求索	(94)
	由正途到歧途	(94)
	由多元到一元	(99)
	价值体系的重建	(104)
	儒家精神的新解释	(108)
第七章	外来文化的刺激与本土文化的反应	(114)
	儒生的懈怠与经学的没落	(114)
	佛学的东来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118)
	本土文化的非理性反抗	(123)
	本土文化的理性反应	(127)
第八章	重建中的中国学术	(132)
	儒家精神的复归	(132)
	对谶纬神学的彻底清算	(138)
	东方人学的复兴	(144)
第九章	政治对学术的冲击	(152)
	权力重心偏移与政治运作紊乱	(152)
	无用的抗争	(156)
	呼唤强人	(161)
第十章	学术对政治的关怀	(168)
	强人政治的缺欠	(168)
	还是要重提儒家伦理	(173)
	消极的抗争	(179)
第十一章	无奈中的士人	(184)
	恶性循环	(184)
	士风转向	(189)
	暂时隐遁	(194)

第十二章	冷嘲热讽：士人的惯用手段	(197)
	谣言的文化意义	(197)
	交会的政治目的	(201)
	清议的客观效果	(205)
第十三章	血雨腥风：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213)
	无力的辩解	(213)
	有力的控制	(220)
	残酷的镇压	(224)
第十四章	政治黑暗与学术进步	(232)
	并非自愿的转变	(232)
	儒家思想的重新建构	(235)
	儒家学术的系统总结	(245)
第十五章	黑暗中的反省	(252)
	政治开明：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253)
	昌言：传统政治体制的必然灭亡	(259)
	申鉴：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结与修补	(266)

第一章 政治统一与学术选择

欲探讨秦汉学术的发生与发展，当然不能无视秦汉社会在中国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事实上，不仅持续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由秦汉时期而萌生，而定型，而且在秦汉之前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发展与成就也只是到了秦汉时期而得以整合与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形而上研究，而是注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政治统一与学术统一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先后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和追求。自从周王室式微，特别是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称雄割据，人民深受战争动乱之苦，迫切要求重建统一的国家，以便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秦朝的统一战争迎合了人们的这一想法，“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②因此，

① 贾谊：《过秦论》。

② 《汉书·严安传》。

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上的统一迅速得以实现，但如何巩固这一军事上的统一，就已不是单靠军事力量所能完全解决的。秦王朝的统治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秦王朝在依靠军事上的实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同时，便着手进行全国的法令、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工作，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期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的国家置于皇帝一人的统治之下，并以期建立千古一系的不朽伟业。这便不得不涉及到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的内在关联问题。

相对说来，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设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的运动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运动，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深层结构，往往并不因政治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秦帝国的建立毕竟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其政治上的变动过速过剧也不可否认超越了人们心理上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当秦王朝积极从事文化方面的变革与统一时，博士淳于越便明确反对，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①期望秦王朝决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在保持社会秩序持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变革。

然而，秦王朝的建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已有的成功使统治者相信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可以依靠强权加以征服的。于是，当有人提出尊重历史传统在刚刚征服的边远地区立诸侯以卫社稷时，“群臣皆以为然”，独重臣李斯持异议。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①这就将原本正确的理论推向极端，以为在帝国内部，不仅政治、经济要统一，文化要统一，而且包括人们的意识、思想都应统一在帝国的根本原则下。

统一思想、意志的想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百家争鸣最为激烈的战国时代，各个学派之间相互攻击辩难，除了探讨真知的目的外，显然都期望以己之道以易天下，将自己的学说作为统一的纲领。孟子的所谓“定于一”，^②荀子的所谓“法后王，一制度”，^③韩非的所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④以及庄子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报怨，^⑤实际上都蕴含着统一思想意识的内在倾向，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得以实现。

秦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为文化上、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统一帝国能否真的成为万世一系的盛事伟业，在相当程度上确也有赖于能否使全体社会公众建立共识，具有统一的意思和统一的思想。在帝国最高统治者看来，如果天下有“异意”，允许人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那就有可能导致帝国的崩溃与瓦解。因此帝国统治者真诚信奉的“安宁之术”，就是“天下无异意”，思想意识的高度集中与统一。他们相信：“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专〕之也。”^⑥

秦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说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任何社会如欲求得稳定与发展，无疑都有赖于社会成员共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荀子·非十二子》。

④ 《韩非子·扬权》。

⑤ 《庄子·天下篇》。

⑥ 《吕氏春秋·执一》。

识的确立。问题在于，这种共识的确立必须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必须充分考虑已有的文化传统。因为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决不是可有可无，或可以武力废除的外在形式，而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国度里，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文化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灵活的文化政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固。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固有的思维定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于是便采取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从现有资料看，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①

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博士淳于越则深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① 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但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患，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思考态度，从善如流，择善而从。

对淳于越的意见，秦始皇并没有怎样责怪，倒是丞相李斯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② 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但其推论则是错误的，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必然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在任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何一种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极为正常的认识现象。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正常表现，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端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必然流露。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即已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面对社会公众对政权的非议，只能疏导，而无法堵塞。很显然，李斯的理论是中国统治学说史上的大倒退。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人言人殊的混乱现象，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府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日益增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本可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到政府的对立面，促进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①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这一点正如司马迁所揭示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日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②这便是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离心者日多的现象，在焚书之事发生之后也有明显的表现，并由此演化成严重的坑儒事件。焚书之后，侯生、卢生曾私下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等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

① 郭沫若：《秦楚之际的儒者》，《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史记·儒林列传》。

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谄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①于是乃远逃他乡。

侯生、卢生的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的警醒。然而，等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政策。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以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②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便可以天下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上引侯生、卢生私议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分子心理方面投下的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的脸色说假话，那么，这个政权还有希望吗？

不久，侯生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的一段对话，不仅深刻地披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真实心迹，而且也准确地预示了秦王朝必然迅速灭亡的悲剧性命运和内在原因。对话不长，节录如下：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说：“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术，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具体事例，略）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匱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暗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身，惜陛下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①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问题而惧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但从秦王朝的文化政策上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政策则又必然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抗。……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恶果。焚书引发的侯、卢事件，侯、卢事件引发的坑儒灾难，以及由此二者所引发的缙绅先生往归陈王，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政策不仅仅关涉文化

^① 《说苑·反质》。

本身，而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朝二世而亡，除了其他复杂的内外在条件之外，而以文化统一、学术统一、思想意识统一为基点的文化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恐怕未始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统治方略的新探索

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是深刻而又惨痛的。西汉王朝重建统一之后，围绕着秦王朝的教训在最高统治层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并最终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这对汉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汉王朝的建立，得之于许多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刘邦的胜利带有一种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后如何治天下，在以刘邦为核心的农民领袖们心目中并非完全有数。这些原本以贩夫走卒为主体的“社会边缘阶级”一旦取得了“社会中心阶级”的地位，实际上也不得不求助于原来的社会中心阶级——知识分子，利用知识分子的智慧重建社会秩序，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

早在刘邦南征北战、平定四海之际，他身边就已网罗了一大批忠诚的知识分子，这批智识者基于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不停顿地为新王朝未来文化政策的设计出谋献策，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汉王朝文化政策的正确性。“陆生（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①于是，陆贾著成

^①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新语》一书，以期为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规划蓝图。

陆贾的思想主旨是鉴于秦亡的教训，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①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性指导原则，而改变“秦以刑罚为巢”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②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思考主要是基于秦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结论。陆贾基于儒学的立场，对先秦诸子持一种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以为诸子的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合理性，但都不足以填补排斥法家之后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真空。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足以弥补废除法家路线之后统治思想真空的惟有儒学。“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只有儒家思想与伦理才是西汉社会发展、繁荣与稳定的治世良药。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陆贾坚决排斥诸子，或者说他较董仲舒之前就有一种独尊儒学的倾向。事实上，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也竭力防止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我们知道，在汉初几十年的学术大潮中，确实已有儒学独尊的思想端倪，叔孙通“儒术不足以进取，可以守成”的说法以及他不惜变通儒学传统以媚权贵的政治实践，都足以表明汉初儒家学者确有一种内在的独尊倾向。不过，面对这种倾向，陆贾并没有随声附和，他虽然基于儒学立场对非儒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也似乎明显地预感到儒学一家独尊所可能导致的恶果。“故良马非独骐驎，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③主张儒学与诸子并重互补，择优而取，因社

① 《新语·道基》。

② 《新语·辅政》。

③ 《新语·术事》。